

陈寅恪晚年

诗文及其他

——与余英时先生商榷

冯衣北 著



花 城 出 版 社

陈寅恪晚年

诗文及其他

——与余英时先生商榷

冯衣北 著

花城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陈寅恪（一八九〇——一九六九）是我国近现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如何实事求是地评价他的生平、思想和学术贡献，是人们所关心的问题。一九八三至一九八五年间，香港报刊曾陆续发表余英时和冯衣北两先生的文章，就陈寅恪晚年所写的诗文进行了讨论，对已故史学家这一时期的生活、工作和心境提出了一系列不同看法，引起了海内外学术界的注意和兴趣。

鉴于余英时先生的部分文章已于一九八四年结集出版，并拟于近期增订再版；我们特将冯衣北先生的文章结集出版，并请作者增写序跋，对问题作了进一步的论辩。为着便于读者统观全貌，书后附录了余英时的有关文章。

在学术以及其他领域内，对同一问题有不同的认识是十分正常的现象，唯有通过严肃认真的讨论，才能使我们的结论臻于真知。希望本书的出版，有利于推进这一点。

序

自从陈寅恪先生在大陆“文革”十年动乱中不幸逝世以来，海内外纪念和研究他的文章和著作很是不少，或伤悼师友，或评析学人，深情卓识之作所在多有。就海外的研究而言，象汪荣祖先生的《史家陈寅恪传》，便是一部态度谨严，持论平允的力作。当然，在目前已出版的有关陈寅恪的各种著述中，由于各人理解的不同，见地的差异，也并不是没有争议的。这本属十分正常的现象。事实上，不同意见的争论，只会有利于推进研究，以达于真知，而不是相反。何况，无论见解如何歧异，只要争议的双方都对陈寅恪先生怀有真诚的感情，而且具有探求真理的共同愿望，便没有理由担心最后不能达于统一。即使暂时无法统一，也不要紧，还可以继续讨论；或者把问题搁置一下，各自加深研究，待到有了新发现后，再来讨论不迟。

就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决定把去年以来所写的

两篇同余英时先生商榷的文章拿来结集出版。余先生是海外学术界中研究陈寅恪较早之一人，远在五十年代末期，他就写出了《陈寅恪论再生缘书后》的文章，在“全无其他任何资料可凭”的情况下，大胆推断该书“实以写‘兴亡遗恨’为主旨，个人之感怀身世，犹其次焉者矣！”在当时海内外学人中，颇引起过一些议论。不过，此后二十多年间，余先生也就没有再写这方面的文章。直到近几年，他才“重理前绪”，在香港《明报月刊》上接连发表了《陈寅恪的学术精神和晚年心境》、《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两篇长文，进一步发挥他的“兴亡遗恨”说，宣言陈寅恪对一九四九年中国大陆政权的易手，充满着明末遗民式的悲愁苦恨。为了支撑这个立论，余先生还提出了“暗码系统”说，认为陈寅恪的晚年诗文中，存在着一套独特的、与众不同的“暗码系统”，要真正理解陈先生的意思，必须运用“侦破”手段才行。对于余先生这一套说法，我无疑是不敢苟同的。这倒不仅仅是因为早在二十多年前，陈先生还健在的时候，就曾明确表示过，余先生当时的说法是“有意挑拨”；并在一九六四年所写的《论再生缘校补记后序》中，以“所南心史，固非吴井之藏”一语，公开作了澄清。我不敢苟同余先生的说法，还因为当我本着深入探讨的目的，运用余先生所指示的一套，到陈先生的晚年诗文中寻求印证时，却发现全然不是那么一回事。这就

令人十分不安。因为陈先生已逝世多年，不可能再起而为自己辩护，何况余先生在文中又极为自信，言之凿凿，简直断不容别人有怀疑的余地。万一读者不察，相信了他的说法，陈先生在世人心目中的形象，就会被蒙上虚假不实的尘垢，这是十分不妥的。所以我不揣简陋，在余先生刊出《陈寅恪的学术精神和晚年心境》之后，勉力草成《也谈陈寅恪的晚年心境》一文，向余先生提出商榷；接着，在读到余先生的续作《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以及附录《古典与今典之间》后，又写了《陈寅恪晚年心境的再商榷》，对余先生仍坚持的一些论点，以及他的那个“暗码系统”说进一步提出质疑。这两篇文章，自然包含了我研究陈寅恪晚年诗文的一些心得。但是我却无意象余先生那样，宣称它们已是“万无一失”，读者可以“放心大胆”地深信不疑，而是认为仍然可以讨论的，如果余先生能提出有说服力的论据的话。

为着帮助读者把握这一场论辩的实质，我愿意在这里把双方的基本分歧归纳说明一下：

一、到底是把陈寅恪当成某种单纯的、固有的观念的化身，还是承认他作为一位正直的学者，不仅具有尊重事实的美德，而且也有着作为“人”的种种复杂性？看来，余先生是主张前者而排斥后者的。因为他把全部注意力都放在寻找陈先生的“心境”同中共当时某些政策和做法相抵触上面，而根本不考虑在另

一些问题上（例如消弭战乱、清除社会积弊，以及民族自主自强等），二者是否也存在着某种共通共存的基础？他只对陈先生那些“不利于共产党”的言辞深感兴趣，而对那些流露好感的作品则十分避忌，对陈先生最终认同于大陆政权尤其无法接受。此外，他还把陈先生作品中的一切愁苦之辞都归结于政治，而完全无视陈先生作为一位残疾之人的独特心境等等。由于余先生在观念上存在着这种功利主义的偏见，所以在研究中就很难作出冷静、客观的分析，而不能不再陷于判断失误。例如他对《庚寅广州七夕》、《庚寅广州中秋作》等诗，对“十年国庆共欢腾”的联语，对《诗存》中许多意思显豁、心境开朗之作的那些“释证”，以及他硬把陈先生自一九五五年起出任大陆政协常委一事，说成只是官方的宣传，不可相信等等，就是显证。而我的看法恰恰相反。我认为，陈先生作为生活在社会巨变当中的一位正直的学者，他的思想呈现出种种复杂矛盾的现象是十分正常的。他可以在某些问题上对中共的做法表示不满，提出批评，但并不妨碍他在另一些问题上抱有好感，加以肯定；他可能由于对中共缺乏接触和了解，从而在政权更替的初期表现出这样或那样的疑惧和不安，但并不妨碍当他有了一定的接触和了解之后，逐步解除了疑惧，安心下来（即使在这时，也仍然会对一些事情感到不理解，情绪有所波动）。至于到了对新政权接触日多，

了解日深之后，他就更会在政治上认同的前提下，对他认为是不正确的那些政策和做法，给予更多的针砭。这一切，都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是合乎陈先生晚年思想发展的逻辑的。只有理解并承认这种复杂性，由此出发去考察和研究陈先生的晚年诗文，才有可能得出合乎实际的结论。

二、存不存在陈寅恪先生重新转向国民党的问题。对此，余先生的答案是肯定的。他断言：尽管在一九四九年十月以前，陈先生对国民党已经“失望到了极点”，但是到了大半年后的一九五〇年七夕，却由于他已经“领略到中共极权统治下的‘透骨新凉’”，和听到不少有关清算斗争的“销魂故事”，因而“对国共两党的感情发生转变”，成了一个类似明末遗民傅青主那样的孤臣孽子，并象被清朝列入《贰臣传》的钱谦益那样，对自己当初没有投奔台湾而悔恨终生。余先生这样说的立论依据就是陈先生在一九五〇年所写的《庚寅广州七夕》、《庚寅广州中秋作》，以及那首“望海”诗，再加上他从《柳如是别传》中摘出的几条“按语”。这些论据到底能否成立，我在文章中已经作了详细的分割，这里不再重复。但是不妨指出，余先生把陈先生对国共两党态度发生转变的时间放在一九五〇年，即中共进入广州仅仅半年之际，于情于理都缺乏可信性（详见拙文《再商榷》）。不过这其实是有苦衷的。因为尽管在一九五〇年七夕之

前，陈先生在诗作中曾经对新政权多次表现出疑虑不安；而在一九五〇年之后，对中共政策的批评针砭也屡见不鲜。但是惟独找不到一首能说明陈先生重新转向国民党的诗作。大约正是在这种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余先生才把眼光集中到一九五〇年的几首诗上，并认为找到最有力的“证据”。然而可惜只是他的误解。随着那几首诗和《别传》中几段“按语”的最终辩明，这第二点的是与非也就一目了然了。

三、在陈寅恪的诗文中是否存在着独特的“暗码系统”？这个问题，我在《再商榷》一文中亦已作了详细的分析，结论是否定的。这里只想补充一点，就是如果真有所谓“暗码系统”的存在，那么它的运用原则必然是：愈是事涉重大，不便或不敢明说，才愈需要运用“暗码”的方式来表达；反之则不然。这应当是没有疑问的。否则“暗码系统”就失去存在的意义。然而，用这个原则去考察陈先生的诗作及余先生的“释证”，我却发现了十分奇怪的情形。例如：《癸巳六月十六夜月食时广州苦热再次前韵》：“墨儒名法道阴阳，闭口休谈作哑羊。屯戍尚闻连渌水，文章唯是颂陶唐……”这是批评大陆当时实行极左的文化政策，“百家争鸣”只是空话；而且只许歌颂，不许暴露和批评。其中第三句还牵涉到朝鲜战争。又如《闻歌》：“江安淮晏海澄波，共唱梁州乐世歌。座客善讴君莫讶，主人端要和声多。”这是不满中共当

时片面宣传“大好形势”，掩盖矛盾和问题。以上两首诗都属于大触时忌一类。但是却明白晓畅，根本没有运用“暗码”来作“掩护”。相反，被余先生言之凿凿地指为是运用“暗码”的“北归端恐待来生”和“天上素娥原有党”等句，则只不过是说“今生不能回北京去了”和“讽刺”新谷莺是中共党员（按余先生的说法）而已——都不是什么了不得的话。这就使事情变得无法理解，仿佛陈先生运用“暗码”的原则同“暗码”固有的作用正相反似的。只此一端，也不难判断所谓“存在着暗码系统”云云，到底有多少可信的根据。

以上是我同余先生讨论陈先生晚年诗文的几点主要分歧。当然，我们的分歧远不止这些，只是由于为了使讨论更集中，未暇一一涉及。我希望，通过前一段时间的辩难，以上的几个主要问题会变得比较清楚一点。不过，我仍想说明，同余先生论辩，是一件颇为费事的工作。因为他为了自圆其说，每每违背旧体诗写作的基本规律，或者对原作进行断章取义的肢解割裂，或者将典故加以随心所欲的曲解，或者远远离开诗句内容所规定的范围，进行无边际的推论引伸，试图通过不断扩大所谓“循环圈”来寻找依据，而毫不理会时空的差异变化。因此，要把所有纰谬之处一一辩明，必须把讨论范围成倍地扩大。这就决不是区区一两篇文章所能容纳的。不过，相信只要把基本问题辩清楚以后，广大读者自能举一反三地去作出判断，

所以也无须再行罗嗦。至于余先生，我只希望他不因我未将全部歧见一一列出，便又误解我“毕竟肯承认”他“所解陈诗大部分是正确的”，那就不胜欣幸了。

最后，附带说一句，余先生在他的答辩文章中，一开始就把我封为“大陆官方学术界”的代言人，说我的文章“基本上是为了表示政治立场、观点和态度而写的”。我很荣幸受到如此“抬举”。只可惜我尚无此种资格。不过无论如何，我仍然得佩服余先生论战方法的巧妙。因为这样一来，我在读者眼中就成了十足的“政治工具”，我的一切文章自然就成了毫不足信的“政治宣传”，简直可以“不攻自破”；相反，余先生则由于及时宣布了他们的立场“不是政治”的，似乎也就成了理所当然的“真理的化身”。然而，学术上的是非果真可以如此解决么？倘使余先生这样认为，又未免“不智”了。我倒主张双方本着对逝者、也对生者负责的态度，通过严肃认真的讨论，使我们对陈寅恪晚年心境的认识，逐步臻于真知。质诸余英时先生，不知以为然否？

一九八五年八月

注：陈寅恪《论再生缘校补记后序》云：“论再生缘一文乃颉龄戏笔，疏误可笑。然传播中外，议论纷纭。因而发见新材料，有为前所未知者，自应补正。兹辑为一编，附载简末，亦可别行。至于原文，悉仍其旧，不复改易，盖以存著作之初

旨也。噫！所南心史，固非吴井之藏。孙盛阳秋，同是辽东之本。点佛弟之额粉，久已先干。裹王娘之脚条，长则更臭。知我罪我，请俟来世。”篇末之两组骈语，从行文来看，第一组是前文之注脚，后一组是感慨之发挥。其中“所南心史，固非吴井之藏”是对“传播中外，议论纷纭”之答复，意谓《论再生缘》虽亦属有所感而发的“心史”，但与藏于“吴井”中，以寄托遗民哀感的那一种“心史”实不相同（对此，汪荣祖先生《史家陈寅恪传》所论甚详，当为确解；而余先生解作：“《论再生缘》既已‘传播中外，议论纷纭’，它当然不再是‘吴井之藏’了。”却未免牵强。因为如果是这么个意思，“固非”一词就必须改作“已非”或“非复”才切当。盖“固非”者，“本来就不是”之谓，怎么好解作“不再是”呢）。“孙盛阳秋，同是辽东之本”即是“……至于原文，悉仍其旧，不复改易”之意，不烦缕述。至于“点佛弟之额粉，久已先干”，也不是如余先生所解释的，指“他（陈寅恪）额上的粉已经干了，而走了的人还没有如约归来”。陈先生在这里借用《杂宝藏经》中：“佛在迦罗卫国，入城乞食，到难陀舍，会值难陀与妇作粉香涂眉间。闻佛至门中，欲出外看。妇共要言，出看如来，使我额上粉末干顷，便还入来”一典，乃着眼于“要言”二字，用意其实仍在《论再生缘》一书——一九六二年春，胡乔木访陈寅恪于中山大学，谈及文集出版事，陈先生慨叹：“盖棺有期，出版无日。”当时胡乔木曾有过“出版有期，盖棺尚远”之允诺。但直至陈先生写《补记后序》的一九六四年底，此允诺仍未能兑现。故而陈先生于此特致感慨，正是题中应有之义。最后“裹王娘之脚条，长则更臭”，是对其本人著作的自谦自嘲之辞。因无异议，故不复论。

目 录

序

也谈陈寅恪先生的晚年心境..... 1

陈寅恪晚年心境的再商榷.....20

附录：余英时文章五篇

陈寅恪的学术精神和晚年心境.....45

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108

陈寅恪晚年心境新证158

古典与今典之间187

“弦箭文章那日休”？198

跋

138883

也谈陈寅恪先生的晚年心境

——与余英时先生商榷

近日检视《明报月刊》，于一九八三年出版的一月号 and 二月号两期内，看到余英时先生撰写的《陈寅恪的学术精神和晚年心境》一文。陈寅恪先生是中国当代著名的史学家，自从他于一九六九年在大陆逝世之后，十余年间，海内外很有一些悼念回忆他的文章，但认真深入地研究和论述他的著作尚不多见。所以余先生此文立即引起我很大的兴趣。然而，结果使我不但十分失望，而且产生极大疑惑。

且申说如下：

首先，余先生所谈论的是陈寅恪先生的“晚年”心境，那么，其时间范围自然主要是指一九四九年陈先生决意留居大陆，到一九六九年他逝世那一段光阴。在这二十年当中，大陆方面对待知识分子的问题

上，确有许多错误。其要者，前期如一九五七年的反右，后期如一九六六年的文化革命，还有形形色色的运动、斗争，都造成了程度不同的恶果。陈寅恪先生作为一位学者，对其当年身历目睹之事，有所不满和非议，是完全可以理解，无足深怪的。假若余英时先生是从这么一个角度出发，如实地探讨陈寅恪的晚年心境，那么，对于了解这位史学大师的生平和思想，可以很有帮助。然而，余先生在论及陈寅恪先生上述的“心境”的同时，却一而再，再而三地把国民党政权牵扯进来，谈论陈寅恪先生对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覆灭如何充满伤悼，对自己当初没有逃离大陆如何后悔不已，又如何象明末遗民拒不仕清那样坚持为国民党政权“守节”；以及日夜盼望台湾的国民党能卷土重来，盼不到时又如何借著书立说来寄托哀感等等。在余先生笔下，陈寅恪先生成为一个钱牧斋式的人物。一个因为未能“扈跸”又未能“殉节”，从而对国民党政权充满愧悔和眷恋的孤臣孽子。

在这里，余先生运用了一个逻辑：在他看来，包括陈寅恪先生在内的中国广大知识分子，一旦境遇欠佳，或是个人的事业和目标遭到挫折，或因受到不公平的对待，对中共政权的政策、做法有所不满或非议，就必然会怀念国民党的统治，把希望寄托于国民党的卷土重来。这难道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形象，这难道就是陈寅恪先生的形象？这个逻辑是难以成立的。

中国文化界不少知名人士在过去相当一段时期内饱受政治运动的冲击，吃了不少苦头，若用余先生的话是：“一有机会，必逃无疑。”何以在出国探亲或访问期间，会坚决谢绝海外亲友劝其留居的邀请，毫不犹豫地返回国内？陈寅恪先生作为一位精研历史，能“通古今之变”的学者，无论其个人立身处世的态度准则如何，有一点可以断言，就是他对于历史发展的大势和个人于国家民族的责任这两点上的认识，决不会同中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相距太远。事实上，一九四九年蒋老先生逃离中国大陆之际，陈先生坚决拒绝傅斯年的一再催请，和某些亲友的劝说，不肯“逃”离广州，最足以说明问题。可是余英时先生却对陈先生的“晚年心境”大表“怜悯和叹息”，把陈寅恪先生说成是胸无定见，徘徊歧路，在其最后二十年间，为自己的“不死不降不走”而整天生活在惭愧和悔恨当中的“胜国遗老”，实在是对陈寅恪先生殊为不敬。

余先生也许会说，他是有根据的，根据就是陈寅恪先生晚年所作的那些诗文。我们只就余先生所罗列的那些所谓“证据”复查一下，看看陈寅恪先生是不是如此这般的一个人。

在陈寅恪先生晚年所写的诗中，确有一部分是针对中共当时的一些错误的政策和过火的做法而发的，其中表达了他正当的怨怼和忧虑。但是，有所针砭是一回事，把自己的命运同什么联系在一起又是另一回事。

这也可以说是我国诗歌创作的一个源远流长的传统。事实上，就陈寅恪先生晚年的诗作而观，也决非如余先生所声称的，只是一片灰暗悲愁，没有丝毫明朗喜悦的色彩，尤其得不出陈先生苦苦怀念国民党政权，盼望台湾能反攻大陆的结论。

余先生极力渲染陈寅恪先生“对国民党的失败不胜惋惜”，“心情十分沉痛”。他特别举出了两首诗作为论据，一首是《己丑夏日》：

绿阴长夏亦何为，消得收枰败局棋。自我失之终可惜，使公至此早皆知。群儿只搏今朝醉，故老空余后死悲。玉石昆冈同一烬，劫灰遗恨话当时。

另一首是《青鸟》：

青鸟传书海外来，玉笺千版费编裁。可怜汉主求仙意，只博胡僧话劫灰。无酱台城应有愧，未秋团扇已先哀。兴亡自古寻常事，如此兴亡得几回。

从表面看，这两首诗均以咏叹出之，感慨深沉，对国民党的失败，确乎没有“幸灾乐祸之意”。然而，也仅仅是如此而已。第一首诗的确是写国民党政权的